

中文版序

提到江蘇豐縣，許多讀者大概會馬上聯想到近年引發廣泛關注的「鐵鏈女」事件。實際上，因為地處江蘇西北部多省交界的偏遠貧困地帶，資源匱乏，民風彪悍，豐縣的歷史不乏慘痛與暴力。即以文化大革命時期為例，種種在其他地區具有普遍性的衝突和矛盾，在豐縣常常會以更極端、更慘烈的形態呈現。部分出於這個原因，本書選擇以豐縣為對象，考察文革期間縣一級的群眾運動和政治鬥爭。

另一個原因，是我們對江蘇文革派性鬥爭多年來的持續關注。在進入這項研究之前，我們已經較為深入地探討過江蘇省會南京市和徐州專區首府徐州市的文革運動。這些背景知識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蒐集和解讀豐縣資料中所隱含的各種重要信息，並進一步幫我們確定了本書的核心議題和論述框架。尤其值得一提，豐縣資料所具有的多元性、系統性和延續性，使本書在論述十年文革前期、中期和後期情況時，在篇幅上大致做到平分秋色。這與許多現有論著主要關注文革前期三年、呈現出明顯的頭重腳輕的格局，存在着顯著差別。

文革是一個舉足輕重卻又內容龐雜的歷史課題，相關的中外研究浩如煙海。我們姑且梳理出如下三種研究路徑：

第一種研究路徑聚焦中共高層精英政治，如馬若德 (Roderick L. MacFarquhar)、羅德明 (Lowell Dittmer)、王年一、弗里德里克·泰維斯 (Frederick Teiwes) 等人的研究。不過一方面此類研究的政治敏感性強，

獲取歷史資料不易，難有推進。另一方面，也容易將文革簡單化為高層政治鬥爭，遮蔽社會、思想、文化、經濟、基層權力關係等其他的重要面相。

第二種研究路徑轉而考察文革期間中國的社會思潮、文化藝術和民眾日常生活，我們姑且稱之為廣義的社會和文化史研究。印紅標、金大陸、雷大年 (Daniel Leese)、彭麗君、何若書 (Denise Y. Ho) 等人的研究都在此列。這是一個前景無限的新領域，但目前尚處於探索階段，因而研究成果不是很多。

第三種研究路徑着重探討地方群眾運動和派性鬥爭，李鴻永 (Hong Yung Lee)、史丹利·羅森 (Staley Rosen)、安德佳 (Jonathan Unger)、陳佩華、凱斯·福斯特 (Keith Forster)、王紹光、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何蜀、吳迪等學者在這方面都有重要研究。此類研究的異軍突起、後來居上，一方面反映了1960年代以來學界同仁研究理念的深刻變化，將關注的重點從少數精英人物轉向廣大的普通民眾；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相對於高層精英政治而言，地方群眾運動和派性鬥爭的政治敏感性相對較低，研究資訊的蒐集相對容易——如各地群眾組織出版物，眾多親歷者保存的工作筆記、日記、書信、揭發批判材料、平反申訴材料以及他們在文革之後撰寫的回憶錄，文革研究者從親歷者那裏採集到的口述資料，加上改革開放初期新編的地方史和地方志等。不過這類地方文革研究論著主要關注若干大城市——如廣州、上海、北京、武漢、杭州、重慶、南京等，很少涉及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群眾運動。這或許會對那些不熟悉那段歷史的人形成誤導，似乎文革時期的群眾運動和派性鬥爭僅限於少數中心城市。

我們的研究，是沿着上述第三種路徑展開的。基於上海、北京、南京、徐州等地的研究，我們發現地方文革運動的複雜性在於，它固然是中共高層和各級地方黨委策動的產物，但群眾運動一哄而起之後便帶有很強的自發傾向，變得難以控制。經過早期一系列事件中的複雜互動之後，地方上普遍出現了相互敵對的兩派群眾組織。當地的黨員幹部 (包括領導幹部) 以及在1967年初奉命「三支兩軍」 (即支左、支工、支

農、軍管、軍訓)的軍隊，也在一系列複雜機制的作用下，不得不在兩派群眾組織中選邊站隊，結果形成了規模更大、全面涵蓋社會各階層的兩派陣營。儘管兩派都在鬥爭中採取了實用主義的話語策略，表現出服從中央、效忠中央的政治姿態，但兩派的分化和對抗其實是由一系列地方性事件引發的。換言之，地方派性鬥爭的基本動力其實來自於地方。這就是中央高層的干預難以收到預期效果的最重要原因。

本書將考察的視閾進一步「下沉」到縣級，這個研究前後持續了十年。我們察覺，縣級文革顯露出一些新的特徵，既不同於有關文革的流行看法，也不同於現有論著中常見的共同主題；進而言之，既不同於官方史書，也不同於不滿官方解釋的個人著述。略舉如下：

第一，軍管是地方文革中的一個重要時期，它大致從1967年初一直持續到1974年底。有些論著將軍隊描述為遏制造反運動和派性衝突、重建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一個嚴重的誤導。當時參加豐縣——以及徐州專區——「支左」工作的部隊並非團結一致，軍隊系統中的不同分支在地方派性衝突中分別支持不同派別。儘管這些部隊最終確實在該縣重建了秩序，但隸屬68軍的主力部隊與隸屬徐州軍分區的地方部隊之間的分裂，實際上為當地的派性鬥爭火上澆油，使其得以長期延續，並且變得更加暴力。這種情況並非是一個特例。在我們此前關於徐州的研究中，在魏昂德近期關於廣西的研究中，以及在一位日本學者關於陝西的研究中，都發現了相同的模式。這實際上意味着，過去常常被視為「穩定力量」的軍隊，在文革的特定時段中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動亂力量」。

第二，那個時代的派性衝突，不能被簡單地描述為不滿現狀的「造反派」勢力與有幸分享權力和特權的「保守派」勢力之間的一場鬥爭。豐縣敵對的兩派分別支持軍隊中的不同分支，同時也從後者那裏得到支持。更為重要的是，當地縣一級、鄉鎮一級和村莊一級的領導人，以及縣城裏和各鄉鎮的學生和工人造反派，實際上都分化為兩派。這些派別是在文革初期一系列事件的複雜互動中形成的，而且兩派都不斷地發生着新的分化和重組。因而，衝突的雙方都包含地方幹部、軍隊幹部、學

生、工人和農民。換言之，這樣的派性鬥爭實際上涵蓋了所有社會階層，而且兩派的社會構成並無差別。此外，這些派性衝突也不能被簡單地描述為民主鬥士試圖推翻壓迫性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的一場鬥爭。事實上兩派之間爭鬥不休，僅僅是為了確保在政治秩序重建之後，本派不會淪為政治犧牲品。我們再次強調，與上述第一點相同，我們並不認為豐縣只是一個特例。我們在早先關於徐州和南京的研究中，以及在中國其他地區的研究中，都發現相同的模式。

第三，即使中國最貧困、最偏僻的地區也會被捲入曠日持久的暴力衝突，而且這些衝突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在此期間，北京政治走向的每一次搖擺和逆轉，都會直接影響到地方上兩派的力量均衡。在豐縣案例中，貫穿於整個十年文革時期，派性分野在時斷時續的衝突中得以長期延續，並不時演化成公開對抗。直到毛澤東去世後，派性問題才最終得到遏制。我們在先前關於江蘇省會南京的研究中，也發現了相同的模式。至於豐縣和南京是否在這個問題上與眾不同，我們期待中國其他地方的文革研究者們能夠給出答案。在我們關於豐縣文革的論述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點是，十年動亂對中國治理體系的嚴重破壞達到了怎樣的程度。只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人們才會更加讚賞文革之後重建黨和國家治理能力的巨大努力。

自該書英文版*A Decade of Upheava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於2021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後，*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Journ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China Informat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等重要學術期刊上已發表了10篇書評。評論人都對本書將文革群眾運動研究拓展到農村地區，對本書運用資料的多元性及其豐富程度，以及書中對縣級政治衝突的詳實敘述和理論闡釋給予了高度肯定。也有學者在此前提下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例如，李懷印認為應該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地探討毛主義國家的性質，以及毛主義國家與鄉村基層社會的複雜互動。賀蕭(Gail Hershatter)則希望能更多地瞭解當地村級領導人與縣級領導人的關係如何，以及大小隊幹部和民兵以外的普通村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捲入了該縣群眾運動和派性鬥

爭。大致歸納一下他們兩位的批評意見，主要是農村基層大隊和生產隊一級的情況論述得還不夠細緻和充分。我們完全同意他們的判斷。我們在書中未能更多地涉及鄉村基層情況，主要是因為難以獲得相關資料。我們樂見其他研究者未來在這些議題上有所建樹，使農村地區的文革運動研究得到拓展與深化。

在中文版即將問世之際，我們還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將本書納入「三十·三十」書系，它已經成為國內外學界公認的共和國史研究領域的橋頭堡。感謝國內文革研究資深專家、《記憶》和《昨天》主編何蜀先生對中文譯稿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見。他的修改意見使我們意識到，英文版的某些語彙運用和行文表述，主要考慮到西方學界同仁的歷史知識背景、學術話語體系和英文表述規範。因此在翻譯成中文時，我們對這些語彙和表述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調整，使之更加貼合中文的歷史語境及其特定的表述方式。此外，我們還訂正了英文版中個別細小的史實錯誤和不夠規範的表述。書中如果還有錯誤和疏漏，我們兩位作者當然是責無旁貸。

董國強、魏昂德

2025年3月